

日本思想家植木枝盛作品的鉴别问题 ——兼论史料鉴别对明治前期研究的重要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那希芳

[摘要] 本文论述了日本明治前期思想家植木枝盛的无署名文章需要鉴别的原因及鉴别方法,并在外崎光广和米原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植木枝盛集10》的《著作目录》中应该剔除非植木作品的文章,以及未被该目录收入但实为植木的作品。这一工作极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植木时无署名文章的判定问题,同时为探讨明治前期无署名文章的鉴别方法提供了新的例证。

[关键词] 明治前期 史料鉴别 植木枝盛

1 日本明治前期研究中的史料鉴别问题

日本史家一般将明治维新(1868)至二战结束(1945)之间的时期称为近代。并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发布之前的时期称为明治前期,将其视为日本近代的起点。这一时期不仅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变革,思想界也先后有启蒙、自由民权、社会改良等思潮出现,社会充溢着丰富的可能性。日本思想界在西学的刺激下对价值和制度展开了新的思考,使得这一时期具有很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近年伴随着对日本近代化开端问题的关心,明治前期的研究逐渐升温(近年的研究主要有:菅原光《西周的政治思想》;真边将之《西村茂树研究》;河野有理《明六杂志的政治思想》;铃木启孝《原敬与陆羯南》;中川未来《明治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与亚洲》等),且仍有巨大的可挖掘空间。

本文着重谈一谈关于明治前期研究的基本问题,即史料的鉴别与分析。虽然在日本江户后期出版业已很发达,但直到明治维新后报纸杂志才

真正兴起。这一新媒体的诞生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与互动,使得言论界空前繁荣。同时,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大量无署名及笔名文章,也给后来鉴别工作带来了困难。

为何明治维新后会出现如此多的无署名及笔名文章呢?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言论政策有关。明治政府于1875年颁布了《新闻纸条例》《谗谤律》等控制言论的法规。因触犯这些法规被处罚的言论界人士不胜枚举(参见宫武外骨《笔祸史》;宫武外骨等《明治新闻杂志关系者略传》)。敏感内容的文章为躲避处罚常不署名。即使在重要的报纸杂志上刊文必须署名时,敏感文章也常常使用笔名。此外,一些小规模杂志的刊文来自投稿的比例较小,大多由几名编辑分头撰写。这时为避免单调呆板的印象并使读者增加新鲜感,同一编辑常会使用多个笔名刊文(同一作者长时间使用固定笔名的情况判定起来不难,在此不做讨论)。

那么,这些无署名及笔名文章是否需要鉴别呢?笔者认为大有必要。首先,在人物研究中鉴别作品真伪、整理著作目录是最基本的工作。梳

理不清会造成误读,甚至弄错思想脉络,最终影响对思想家的整体定位。其次,即便不做思想家个案研究,弄清作者也有助于判定作品的性质和写作背景,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和理解。下面笔者将以植木枝盛(1857-1892)研究为例来探讨无署名及笔名文章鉴别的必要性及方法。

2 植木作品的写作背景及鉴别的必要性

日本明治前期有一位很重要却未被足够重视的思想家,他就是植木枝盛。植木的思想横跨启蒙、自由民权及社会改良三个维度,他的思想同时受到东方的儒学、老庄、佛教思想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双方面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透过植木,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明治前期的思想与社会。植木的思想对于研究西学东渐、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等问题也颇具参考价值。二战后植木的思想被重新发掘,到七十年代末为止涌现过一股植木研究的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家永三郎(1913-2002)的《植木枝盛研究》和米原谦(1948-)的《植木枝盛》。在我国,王家骅(1941-2000)、许晓光(1955-)等研究者也较早关注了植木并撰文介绍。笔者亦从事植木研究多年,在这里想谈一个植木研究的基本问题,即史料的鉴别与分析。

植木长期作为报纸杂志的主笔发表文章,出版过多部著作,还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手稿。1990至1991年家永三郎等人收集整理《植木枝盛集》10卷本问世,囊括了植木的大部分作品,给植木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值得注意的是,该选集收录了大量的无署名文章,第10卷所收的《著作目录》中还列入了更多未被收入选集 of 无署名文章。编者家永三郎早年曾说过这些无署名文章难于鉴别,只好将“植木处于主笔或类似主笔地位的报纸杂志的无署名社论,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都视作是他的文章”^[1](笔者译)。因此家永在编写《植木枝盛集》时将以下报纸杂志上的无署名文章统统收入了《著作目录》:《海南新志》《土阳新闻1》(1879年1-4月)《爱国志林》《爱国新志》《世益杂

志》《高知新闻》《土阳新闻2》(1881年6月中旬至1882年3月、1885年9月20日至1889年8月)^[2]。但实际上这些无署名文章是否为植木所作还值得商榷。很多植木研究者都指出这一问题,但因耗时及方法论的困难等原因,鉴别工作迟迟未展开。只有外崎光广(1920-2002)对植木的家族论和女性论相关文章做了鉴别整理(外崎光广编《植木枝盛家族制度论集》;外崎光广编《植木枝盛妇人解放论集》;外崎光广编《家庭改革、妇人解放论》),米原谦对此也略有提及。因此,植木的无署名文章的鉴别工作既重要又尚待解决。

2.1 早期报纸杂志投稿与底稿之间的差异

植木于1857年生于日本高知县,11岁时迎来明治维新,16岁赴东京接受新式教育,18岁再赴东京,自学西学。同年10月他开始在《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走上了新闻记者的道路。虽然人们提起植木会首先想到他是自由党创始人、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笔者却认为新闻记者这一身份对于植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植木写于1875-1877年间的文章多是为报纸杂志投稿而作,一般留有底稿(主要收录于《天放堂哀说》《论说汇集一》)。这两本集子均未出版,现收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宪政史编纂会收集文书》中的《植木枝盛关系文书》。笔者经过对比发现,新闻投稿与底稿之间存在诸多差异。

例如,植木的论文《猿人政府》(1876年2月11日,《天放堂哀说》)在发表于《邮便报知新闻》时,编辑擅自将题目改为《猿人君主》(《植木枝盛集3》)。结果这一具有挑衅性的题目触犯了《新闻纸条例》,植木被处以两个月的监禁。还有,论文《私有论》(1876年2月24日,《天放堂哀说》)在发表于《邮便报知新闻》时被删约1500字,且投稿与底稿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论文《读禁狱罚金一览表》(1876年6月8日,《论说汇集一》)在发表于《湖海新报》时,底稿中的“盛服先生”一词(引自路温舒的《上尚德缓刑书》)被编辑错改为“盛服君子”。类似修改还有很多,有时编辑的修改甚至有损作者原意。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植木的早期作品时

应尽量使用底稿。而不是像此前的植木研究者那样,只使用报纸杂志上的投稿。此外,植木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草稿,几乎从未被提及。考察这些史料对全面理清植木早期的思想脉络亦十分重要。

2.2 关于《海南新志》与《土阳新闻1》

植木在东京游学期间结识了同乡出身的政治家板垣退助(1837-1919),受板垣的影响他逐渐对民权问题产生兴趣。1877年2月日本爆发内乱,植木遂随板垣返乡。板垣不赞同武力反抗政府,主张设立宪法召开国会以监督政府。回乡后不久他便创办了杂志《海南新志》鼓吹民权与立宪。该杂志后更名为《土阳新闻》(为区别于后续同名报纸这里称其为《土阳新闻1》)。1878年8月至翌年4月,两杂志共发行了29期(收于《海南新志·土阳杂志·土阳新闻》)。植木因得到板垣的信任担任了两本杂志的主编,因此关于在两本杂志上发表的无署名文章,家永认为如无反证皆可视为植木的作品。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植木日记记载,板垣等为出版杂志于1877年8月成立高阳社,该社至少活动至1878年12月(《植木枝盛集7》),由吉田正春(1852-1921)、植木枝盛、细川浏(1856-1934)三人任主编(《植木枝盛集10》、铃木安藏编《自由民权运动史》)。同月25日《海南新志》开始发行。植木承担了很多工作,据后来人回忆“海南新志主要由植木枝盛负责,该杂志上发表的论说具有植木高尚致密的思想 and 板垣退助的锐利深远的推理力,当时政府唯一的机关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也无法抵挡其论锋,总是只有遁词而不敢从正面还击”^[1](笔者译)。但不久后他却想退出高阳社,这是何故呢?

首先,植木当时刚满20岁,虽然才能得到板垣的赏识,但他没有杂志编辑方面的经验,很难想象他一人独担编辑重任。我推测可能是他与其他编辑意见不合才提出退社的。果真如此的话,可见植木在高阳社的地位并不稳固,后来人的回忆可能有夸大的成分。

其次,《海南新志》的发刊词《绪言》(《植木枝

盛集3》)一直被认为是植木所作,经笔者核实植木所写的《绪言》(收于《文集》,该文为无署名文章。但其主旨与植木的文章《极论今政》一致,可推断为植木的文章)只被部分采纳并放在了结尾部分。发刊词的前半部则出自他人之手。由于其中批判当时报纸的内容与细川浏的《新闻分拆论》(《土阳杂志》1号,1877年8月25日)一致,可断定《海南新志》的发刊词《绪言》前半部分由细川撰写,该文乃细川与植木共同的作品。

此外,《海南新志》前5期刊登的14篇文章中植木的文章仅3篇。其中第5号刊登的植木的文章《论期待明治的第二次改革》(1877年9月22日)在印刷前,部分内容清样时被涂上墨汁删去,共计删除63字。植木的这篇文章主要参考了西村茂树(1828-1902)的《政体三种说》(《明六雜誌》28号,1875年2月)。西村将政体分为“因袭政治”“因袭道理混交政治”和“道理政治”。并说三者分别对应“人君独裁”“君民同治”和“平民共和”政体。根据前后文可推测被删部分是西村所说的“道理政治”即共和制政体的有关内容。很可能是其他编辑考虑到这一话题的危险性,删去了该部分。植木恰在此时提出退社,也许是他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件事也说明植木在杂志编辑工作中并不能掌控全局。

1878年初由于《土阳新闻1》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批判政府欲使明治时代之人民成为尧舜之民的谣传及评论》(《土阳新闻1》25号,1878年2月15日)与《论专制政府如坐于火山之巅》(《土阳新闻1》29号,1878年3月10日)招来笔祸(我认为两篇都是植木的作品,详见后文),高知县于3月19日向高阳社下达了《裁判宣告书》(《土阳新闻1》31号,1878年3月25日)。据植木的记载,细川浏于同月20日离开了高阳社(《植木枝盛集7》)。《土阳新闻1》于4月25日发行了第37期后停刊。

查阅细川走后刊行的《土阳新闻1》可发现,植木执笔的文章增加了不少。但说到细川担任编辑期间出版的《海南新志》与《土阳新闻1》的1-30期,据笔者推测由植木一人独掌编辑大权(家永三郎说)的可能性不大。这一点无论从杂志内容还是

从植木日记的记载都能得到证实。据日记记载,植木在1878年9-10月承担了很多印刷校对工作(《植木枝盛集7》)。细川与植木是同乡,他们幼时曾同在一所学校读书,应该彼此熟识。细川于1874年5月至翌年2月在庆应义塾读书(参见《细川浏君小传》《明治文化资料丛书12 新闻编》及《日本基督教历史大事典》)。根据植木的日记,他在东京游学期间常旁听庆应义塾举办的三田演说会,还听过几次细川的演讲(《植木枝盛集7》)。因此,学识与经验都比植木丰富的细川在编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根据以上理由,笔者认为不应对植木在《海南新志》与《土阳新闻1》两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做过高估计。两杂志上的无署名文章不可无条件视作植木的文章,应逐一推敲。此外,有些非植木常用笔名的文章,亦有他执笔的可能,应一并进行核实。

2.3 关于《爱国志林》与《爱国新志》上的无署名文章

根据植木的日记,板垣等早在1878年2月就开始商议在大阪办报之事(《植木枝盛集7》),由于经费不足,后改为创办杂志。他们成立了爱国社作为杂志的发行机构。爱国社于1880年3月13日发行了第一期杂志《爱国志林》。该杂志后更名为《爱国新志》(两杂志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6 自由民权篇下》)。到1881年7月被《高知新闻》合并为止,该杂志共发行了46期。《海南新志》与《土阳新闻1》停刊后,植木一面参加政治活动一面潜心写作,先后出版了《开明新论》《民权自由论》和《赤穗四十七士论》三部著作。《爱国志林》的创办历时两年为植木提供了新的言论平台。然而是否如家永三郎所说,植木是两杂志实质上的主编,其中的无署名文章都可视作他的文章呢?笔者认为这一点也是有待商榷的。

在杂志的编辑过程中,永田一二(1850-1897)的工作不可小觑。永田于1871年起在庆应义塾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877年7月受高知县立志学舍的邀请前去任教(参见《国史大辞典》)。据植木记载,永田于1878年2月离开高知回到东京,

继续在庆应义塾教书。其后被聘任为《爱国志林》的编辑,他于1880年2月抵达大阪,立即与植木等人会面,商议杂志创办事宜(《植木枝盛集7》)。此后约一年的时间里,永田承担了杂志创办的有关工作。

总的来说,《爱国志林》与《爱国新志》中的文章来自外部的投稿不多,主要由植木和永田分头执笔撰写,杂志的经营另有人负责(主要有小岛忠里、森肋直树等人。详见《植木枝盛集7》)。杂志发行后不久永田即连载了他的大作《国会论》,其中的重要观点很快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指针,可见永田的地位之重要。据笔者判断,两杂志所刊无署名文章中也有很多是永田的文章。另外,此时期植木的政治活动繁多,他可能无法将所有精力倾注于杂志上。杂志的编辑工作应该是以永田为主力开展的。

据植木记载,1881年1月《山阳新报》邀请永田去做主编,永田遂决定离开高知前去赴任。植木等爱国社同仁于2月28日为永田送行,从此他失去了杂志编写工作的合作者。同年1月15日的植木日记中有“书写爱国新志”的字句(《植木枝盛集7》),这应该指的是植木接替永田编写第21期《爱国新志》。此后杂志上不再刊登永田的文章,第21-36期《爱国新志》的执笔与编辑工作主要落在了植木的肩上。因此这一时期杂志上的无署名文章全部由植木创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关于同时期植木主编的《世益杂志》(1880年9月刊行,现存7期,藏于东京大学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虽然植木曾高度参与,但仍很难判断其上的无署名文章皆为植木所作。例如,该杂志所刊《国会论》(《世益杂志》1-2号、4-6号,1880年9-12月)乃是永田一二同名作品的通俗普及版,不是植木的作品。因此,该杂志上的无署名文章也是需要逐一鉴别的。至于《高知新闻》(1880年7月5日-1882年5月14日)、《土阳新闻2》(1881年12月14日-1891年12月)这两份报纸,编辑和社说撰写人员的构成更为复杂,即便是植木担任主笔期间的无署名文章,也很难一律视为植木所作。

3 《著作目录》所收无署名论文的鉴别方法及举例

3.1 植木作品的鉴别

植木的早期作品鉴别起来并不难,此时他刚在言论界崭露头角,惯于在投稿中署真名。署笔名的文章也经研究者的鉴别得到证实(详见家永三郎《植木枝盛研究》的序言部分)。

对于1878年后植木在其主编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无署名及笔名文章,则需进行鉴别。因为这些报纸杂志并非由植木一人编写。在进行鉴别时外崎光广的文本细读法值得学习:如果两个文本存在内容重叠、主旨或结论相似、使用词语高度类似、引文一致等特点,则可判断其为同一人所作;如果植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其他作品的内容,则可判定被提及的作品为植木所作;植木有一本随笔集《无天杂录》(《植木枝盛集9》),内容多为创作笔记。如果某文的内容与《无天杂录》的记录接近,亦可判断其为植木所作;植木的日记有时也记录他何时写了哪篇文章,参考日记亦可得到线索。

外崎所做的鉴别工作仅限于家族论及女性论相关文章,我们还需对其他无署名文章进行鉴别。一般来说《著作目录》列出的文章可视为植木作品的最大范围。在家永等人的博搜密访下,极少有被漏掉的作品,只有米原谦曾指出一篇(《论日本具有宜行自由主义之国格》,《自由新闻》1884

年1月26日-3月20日)未被《著作目录》收录的植木作品(参照米原谦《植木枝盛》)。这里我想举两篇新发现的植木作品。

第一篇是署名“钟权次”的论文《批判政府欲使明治时代之人民成为尧舜之民的谣传及评论》(《土阳新闻1》25号,1878年2月15日)。文中“人民视邦国之安危,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笔者译)的相关内容(《民权自由论》(《植木枝盛集1》))一致,且“清盛大入道”的相关内容(《言论自由论》(《植木枝盛集1》))。《民权自由论》与《言论自由论》在当时都已发表且很有名,因此可判断此文章为植木的作品,“钟权次”是植木的一个不常用的笔名。

第二篇是无署名文章《论专制政府如坐于火山之巅》(《土阳新闻1》29号,1878年3月10日)。文中的“宰相梅特鲁尼奇”及“英国公使某”的相关内容(《自由政治论》)一致,且文中出现的“专制政府如坐于火山之巅”的说法在植木的其他作品中也常见,因此可判定此文章为植木的作品。《自由政治论》的写作年代原本不详,通过上述文本间的相似性可判断其写作时间应在1878年前后。

根据上述方法,笔者认为以下未被《著作目录》收入的文章是植木的作品(见表1)。

3.2 非植木作品的剔除

除上述情况外,《著作目录》列出的文章一般可视为植木作品的最大范围。需要做的工作是对这个庞大目录内的作品进行逐一鉴别核实,为其

表1 未被收入《著作目录》的植木作品

(1)大南太郎「読大阪日報」『海南新誌』9-10号,1877年10月27日,11月3日。
(2)石井鶴樹「紙鸞の説」『海南新誌』10号,1877年11月3日。
(3)白河亀「ボリスの黒焼論」『土陽新聞1』21号,1878年1月25日。
(4)東海漁人草「日本政府の压制ならざるを論ず」『土陽新聞1』24号,1878年2月10日。
(5)鐘權次「政府明治年代の人民をして堯舜の民たらしめんとするの風説を駁す并に評」『土陽新聞1』25号,1878年2月15日。
(6)「専制政府は火山の頂に坐するが如きの論」『土陽新聞1』29号,1878年3月10日。
(7)石井鶴樹「国会は県会の基県会は区会の本」『土陽新聞1』同上。
(8)无署名「裁判申渡書の疑問」『土陽新聞1』31-33号,1878年3月25日,30日,4月5日。
(9)鐘權之丞「官府は文明に幾許の影響を与うる乎」『土陽新聞1』35号,1878年4月15日。

中的无署名文章给出鉴别依据,剔除那些非植木作品的文章。例如,经笔者鉴别,以下三篇都不是植木的作品。

第一篇是《政学初论》。经仔细核查,该文是福泽谕吉(1834-1901)的著作《西洋事情》的摘抄。目前为止植木研究者基本都将此文视作植木的作品加以论述,无疑是个不小的误会。

下面两篇无署名文章的鉴别对植木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一篇是《论可使琉球独立》(《爱国新志》26号,1881年3月6日,收于《植木枝盛集3》)。把这篇文章视作植木的作品存在以下疑点:从用词来看,文中称亚洲时使用了“亚洲”(4次)、“亚西亚州”(1次)、“亚细亚”(1次)、“亚细亚洲”(1次),而遍览植木的作品,他从未使用过“亚洲”和“亚西亚州”这两个词;文中频频出现的“武力主义”“开明主义”这两个词在植木的其他文章中从未出现过;更为重要的是,该文的主旨游移不定,没有植木文章惯有的观点鲜明、论证明快的特点。其观点如下:面对欧洲对外扩张的“武力主义”,亚洲要用“正理”和“开明主义”去应对,并坚持“国家同等论”。占有琉球的行为类似欧洲的“武力主义”,虽对日本有利却违反“开明主义”和“真理”。琉球具有“一国之形”,应使其独立,这样可以示大义于天下,为世界创立“仪则”。但作者随后笔锋一转,他并非认为琉球必须独立,如果维持现状不会带来麻烦。所谓麻烦指的是不得不与外国交战,或强占琉球的“残忍酷虐”结局。这样说是因为1880年8月-1881年1月的两国交涉中,有过“分岛增约案”的讨论,拟将宫古、八重山两岛归中国(参见山村健《琉球分岛问题的结局》)。这时文章开头主张的“正理”忽然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对日本得失的计较和不忍琉球被瓜分的同情心。而植木很少有这种摇摆不定的主张。另外,此文发表的同月8月,植木草拟了《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案》。其中标明了“琉球州”为“日本联邦”的成员^[4]。如果该文出自植木之手,那他将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了。

判定《论可使琉球独立》非植木的作品,可使我们明确植木在琉球问题上的观点,进而在对外

认识论方面还原出更加真实的植木形象。此前很多学者盛赞植木主张琉球独立的观点很伟大,果真如此虽好,但很遗憾通过严谨的史料分析无法得出该结论。

另一篇值得商榷的文章是《无神论》(《高知新闻》1882年1月5-7日,收于《植木枝盛全集3》)。将该文视作植木的作品存在以下疑点。从用语来看,文中的以下词汇未在植木的其他文章中出现过:“结果”(8次)、“意识”(7次)、“觉性”(7次)、“外界”(6次)、“实在”(4次)、“印象”(2次)、“客观”(1次)、“界限”(1次)、“格物穷理”(1次);此外,该文的主旨也与植木以往的主张矛盾:五官只能通过“知觉”和“感觉”产生“意识”,因为“上帝”的存在不能通过“五官”来“感觉”和“知觉”到,所以人无法“意识”到“上帝”。植木一向非常重视五官以外的“心才”和“灵智”,同一时期他特别强调“心”的力量,认为人心可以直接与天地万物相通。因此他是不会否定“五官”不可感知的东西的。另外,此时期的植木作品中有大量对宇宙主宰者的描写,这也与“无神论”的主张矛盾。

判定《无神论》非植木的作品,对于植木研究至关重要。在探讨植木的世界观和对超越者的认识时,有些学者以这篇《无神论》为依据论述植木思想中作为超越者的神消失了,批判他的傲慢,说他在否定“神”的同时把“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样的观点显然有误。笔者认为植木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他并非完全否定超越者的存在。

根据上述鉴别方法,下列文章疑不是植木的作品,是否应当编入《著作目录》需要再加斟酌。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细论证,仅列举主要理由如下页表2。

4 结 语

本文论述了植木枝盛的无署名及笔名文章产生的背景和鉴别方法,在外崎光广和米原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著作目录》中列出的文章做了鉴别,增加了《著作目录》未列出但实为植木作品的文章。剔除了《著作目录》中列出的但实非植

表2 《著作目录》中收入但实非植木作品的文章

a. 本文已论证非植木作品的文章:
(1) 無署名「琉球の独立せしむ可きを論ず」『愛国新誌』26号, 1881年3月6日。
(2) 無署名「無神論」『高知新聞』1882年1月5-7日。
(3) 無署名「政学初論」『植木枝盛関係文書』1975年1月1日。
b. 用词及行文习惯与植木作品存在较大差异:
(4) 柏木震「人間の思想を平均せんとする説」『海南新誌』2-3号, 1877年9月1日, 8日。
(5) 柏木震「建議の間違」『土陽雜誌』5号, 1877年10月5日。
(6) 竹中重太郎「治乱論」『土陽新聞1』25号, 878年2月15日。
(7) 竹中重太郎「民間の才藪の如く数多なるの弁」『土陽新聞1』27-28号, 1878年2月25日, 3月5日。
c. 疑为植木在编辑工作上的合作者永田一二的作品:
(8) 無署名「加一針於都人士」『愛国志林』1-2編, 1880年3月13日, 5月8日。
(9) 無署名「天爵と人爵の弁」『愛国志林』7編, 1880年7月6日。
(10) 無署名「革命の原由」『愛国志林』8編, 1880年7月13日。
(11) 無署名「煤掃の説」『愛国志林』9編, 1880年7月24日。
(12) 無署名「各地の国会希望者に就て論ず」『愛国志林』9編, 1880年7月24日。
(13) 無署名「大邦と小邦の利害」『愛国志林』10編, 『愛国新誌』4号, 1880年8月8日, 9月6日。
(14) 無署名「幫間論」『愛国新誌』2号, 1880年8月21日。
(15) 無署名「国会論」『世益雜誌』1-2, 4-6号, 1880年9月-12月。
(16) 無署名「公德と私徳を論ず」『愛国新誌』5号, 1880年9月13日。
(17) 無署名「改進黨の変遷」『愛国新誌』6号, 1880年9月22日。
(18) 無署名「文明の弊を論ず」『愛国新誌』8号, 1880年10月5日。
(19) 無署名「国会開設請願の委員に告ぐ」『愛国新誌』9号, 1880年10月13日。
(20) 無署名「政談の盛んならざるを憂う」『愛国新誌』12号, 1880年11月5日。
(21) 無署名「天然の権理と法律上の権理を論ず」『愛国新誌』13号, 1880年11月12日。
(22) 無署名「東京の国会期成同盟会の結果如何」『愛国新誌』14号, 1880年11月20日。
(23) 無署名「法律は宜く公議輿論に循て制定せざる可らず」『愛国新誌』17号, 1880年12月12日。
(24) 小使某稿「都人士に質し并せて同志諸君に告ぐ」『愛国新誌』19号, 1880年12月26日。
(25) 無署名「都人士は何ぞ愛国心に乏しき耶」『愛国新誌』同上。
d. 文章主旨与植木的一贯观点不吻合的作品:
(26) 無署名「婦人の影響」『愛国志林』5編, 1880年6月18日。
(27) 無署名「変遷論」『愛国新誌』11-12号, 1880年10月28日, 11月5日。
(28) 無署名「政府の本分を論ず」『愛国新誌』12号, 1880年11月5日。

注

- [1] 家永三郎. 植木枝盛研究[M]. 東京: 岩波書店, 1960: 24.
 [2] 植木枝盛. 植木枝盛集10[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346.
 [3] 鈴木安藏編. 自由民権運動史[M]. 東京: 高山書院, 1942: 4.
 [4] 植木枝盛. 植木枝盛集6[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100.

参考文献

- 王家骅. 植木枝盛の自由民権思想と儒学[J]. 历史研究, 1996(03).
 许晓光. 日本明治前期の立宪主义思想争鸣[J]. 世界历史, 2015(2).
 许晓光. 明治前期日本思想家对国与民关系的近代性阐释[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1(1).
 山村健. 琉球分島問題の結末[J]. 戦史研究年報, 2000(3).

木作品的文章。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发现,重要文章的鉴别可引导我们对植木的思想进行再解释和再定位,塑造更加真实的植木形象。

通过植木的例子可以发现,在开展明治前期的研究时,大量存在的无署名及笔名文章的鉴别工作既紧迫又重要,是我们进行文本分析的前提。平山洋(1961-)凭借其《福泽谕吉全集》中无署名文章的鉴定工作在日本学界获得了不小的声誉,其原因正在于此。《中江兆民全集》的编者对无署名文章的处理(该编写委员会所采用的鉴别方法主要是对常用词汇进行校验)也很成功,值得我们借鉴(详见松永昌三《解题》)。然而无署名及笔名文章的鉴别工作还开展得远远不够,为提高研究的准确度并深化研究,这项工作还需深入展开。本文无疑是其中的一次小小尝试,希望能够对中国以及日本学界的植木研究有所裨益。

- 无署名.政学初論.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71.
 日本キリスト教歴史大事典編集委員会編.日本キリスト教歴史大事典[M].東京:教文館,1988.
 中川未来.明治日本の国粹主義思想とアジア[M].東京:吉川弘文館,2016.
 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真実[M].東京:文藝春秋,2004.
 西村茂樹.政体三種説[J].明六雑誌28号,1875(2).
 米原謙.植木枝盛[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
 佐々木秀二郎.新聞記者列伝2[M].東京:共同社,1880.
 松永昌三.解題[M]//中江兆民全集14.東京:岩波書店,1985.
 国史大辞典[M].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1997.
 明治文化研究会編.明治文化全集6自由民権篇下[M].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明治文化資料叢書刊行会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12新聞編[M].東京:風間書房,1972.
 河野有理.明六雑誌の政治思想[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真辺将之.西村茂樹研究[M].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
 家永三郎.外崎光広編.海南新誌・土陽雑誌・土陽新聞[M].東京:弘隆社,1983.
 家永三郎.植木枝盛研究[M].東京:岩波書店,1960.
 宮武外骨.西田長寿.明治新聞雑誌関係者略伝[M].東京:みすず書房,1985.
 宮武外骨.筆禍史[M].東京:雅俗文庫,1911.
 菅原光.西周の政治思想[M].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
 植木枝盛.天放堂哀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68.
 植木枝盛.文集.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71.
 植木枝盛.自由政治論.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71.
 植木枝盛.植木枝盛集1—10[M].東京:岩波書店,1990.
 植木枝盛.極論今政.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68.
 植木枝盛.論説彙集一.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68.
 植木枝盛.論説彙集二.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リール番号168.
 鈴木安蔵編.自由民権運動史[M].東京:高山書院,1942.
 鈴木啓孝.原敬と陸羯南[M].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15.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M].東京:慶應義塾出版局,1872.

作者简介 那希芳(1979—) 女 锡伯族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naxifang@foxmail.c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 Case Study of the Works of the Thinker Ueki Emori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an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non-signed articles by Japanese thinker Ueki Emori in early Meiji Japan.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Ueki Emori researchers Sotozaki Mitsuhiro and Yonehara Ke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works which are not really Ueki Emori's works but which are lis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of Ueki Emori Syu10*. The paper also describes works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of Ueki Emori Syu10*, but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Ueki Emori. This will effectively help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non-signed articles found during the study of Ueki Emori, and can provide a new paradig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non-signed articles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Keywords: Early Meiji Study;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Ueki Emori

Author's Information:

Na Xifa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Lectur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naxifang@foxmail.com